

热历史

和平性植根于中华文明深处

1月28日是和平共处国际日。

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，深知和平之宝贵。和谐稳定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生活方式，和平共生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处世之道，和合仁善是中华文明几千年来文化基因。在长期发展中，中华文明形成了特有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、协和万邦的国际观、和而不同的社会观、人心和善的道德观、和平正义的战争观，和平性植根于中华文明深处。

中国古人认为，天地化育万物，诞生人类，天地人互相联系。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强调普遍联系和整体思维，将自然之道和人间伦理有机联系起来。宇宙万物、人类社会既千差万别又是一个统一整体，和合相生、生生不息。这一宇宙观蕴含着顺应自然、敬畏自然、敬畏秩序的文化基因。和谐、稳定、秩序是中华先民史前时期就形成的生活方式，并一直延续下来。比如，考古发现表明，八千年前西辽河流域兴隆洼文化的村落里房屋成排分布，六千多年前黄河中游仰韶文化的姜寨等村落里房门朝向中央广场，都显示出社会内部崇尚集体利益，社会秩序井然。八千年前黄河流域裴李岗文化等的墓葬排列整齐，已有“族葬”习俗，将现实社会秩序延伸到身后世界。无论是聚落、墓葬的排列有序，还是都邑的中轴对称，礼器的成组成套等，都体现出中国人对秩序和稳定的不懈追求。

中国古代主张天下万邦和谐相处、和合共生，不滥杀无辜，不绝人祭祀，形成了协和万邦的国际观。比如，西周建立后不但封商人后裔于宋，而且神农、黄帝、尧、舜、禹之后也都各有封地，这与侵略扩张的帝国观有着重要区别。早期中西文

化交流在五千多年前就已出现，中国在西传彩陶、黍、粟等的同时，也接纳了西来的绵羊、黄牛、小麦、冶金术等。汉代丝绸之路开通以后，丝绸、瓷器、造纸术、印刷术、指南针、铸铁技术等生活用品和民用技术从中国传到西方各地，传播方式是和平交往和商业贸易而非侵略战争。与其他文明交流互鉴、和平共生，是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处世之道。中华文明的发展，正是不同文明通过相互对话、相互交融获得共同进步的例证。当今世界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、2500多个民族和多种宗教，不同文明各有特色、各有所长。彼此尊重、相互依存，包容互鉴、共同发展，人类文明才能不断发展进步。

和平也是中国伦理和思想的重要准则。中国人对和平的追求还体现在社会观和道德观上。“和实生物，同则不继”“君子而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”“和羹之美，在于合异”。中国地理环境广阔多样，族群文化多姿多彩，但在距今六千年左右就形成了早期中国文化圈，各民族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强烈的共同体意识、共同价值追求和文化认同，这是和而不同观念发展的必然结果。五音相和才有旋律，五味调和才成美味。和而不同是人类社会和谐稳定的秘诀。上善若水，仁者爱人。从善爱自身、家人推及仁爱他人、社会，这是中华民族美德的核心内容。和平与“仁”的价值相结合，通过对他人的关心关爱践行和平性的理念。在过去两千多年时间里，中国在多数时期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，但中国没有对外扩张和殖民，这是中华民族和善友爱的证明。

当然，战争有时是难以避免的，和平性并不意味着懦弱。中华民族

一直以来秉承和平正义的战争观。中国人深知“兵者不祥之器，非君子之器，不得已而用之”的道理。文武之道，先文后武，先礼后兵，不挑起战争，也不畏惧战争，战争必出于正义、为了和平。

中华文明何以具有突出的和平性？原因是多方面的，深厚的农业基础是孕育和平性的重要土壤。可以说，和平是中华文明从源头开始的内在追求。中国大部分国土位于气候适中的中纬度河流地区，具备农业发展的良好条件。农业生产需要较长周期，种子的选育、土地肥力的维持、生产工具与设施的制备、水利设施的建造维护、生产经验的传承等，都需要长期稳定的社会秩序。中国古代有着世界上最大范围的农耕区，加上“南稻北粟”农业结构体系的互补，以及小麦等农作物的传入，粮食来源相对稳定，为稳定定居、和平发展奠定了基础。中华先民眷恋故土，大多数情况下的迁徙不过是农人对新耕地的开垦，在漫长岁月中形成了追求秩序、稳定内敛、爱好和平的文化性格。

和平使文明成果得以长期保存，和谐使文明得以稳步向前，和平性为中华文明绵延不绝发展提供了保障。

今天，我们依然走在和平发展的宽广道路上，以和平的方式实现了一个超大规模国家前所未有的发展。中国和平发展成功的各项原因背后都有中华文明智慧的光芒，都是我们文明基因与现代精神的结合。我们要始终坚守并不断激活和平的文明基因，同一切进步力量携手合作，推动不同国家、不同文明在平等、互鉴基础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，开辟人类社会更美好的未来。（《人民日报》）

生活史 古人“授时”方法多

授时，就是解决时间同步的问题。

晨钟暮鼓是我国最早用来统一时间的方法，在唐朝已经发展得非常成熟。那时候，稍大一点的城市里都建有钟鼓楼。早上敲钟，城门打开，人们可以随意进出城；晚上敲鼓，宵禁开始，所有人禁止随意走动。每个时辰不同的钟声或鼓声成为人们生活、工作的标准时间。这种晨钟暮鼓的报时方式在我国延续了上千年。



▲永济博物馆历史文化展出的锣 记者 刘亚 摄

打更报时是专门在夜间进行时间传递的方法。更夫夜间不能睡觉，需要通过滴漏掌握准确时间，再用梆子或锣声将准确的时间传递给人们。

清朝末年，高楼渐多，钟声逐渐被越来越多的高楼阻挡，于是便有了午炮报时。每天中午12点整，午炮便发出响彻大街小巷的轰鸣声，以提示人们矫正落地摆钟的时间。

17世纪后，航海业发展迅速，对报时要求越来越高。由于不同时间的海潮高度是不相同的，利用精确时间可以知道船只位置，避免触礁。落球报时是在码头、港口等地的高竿上挂上圆球，并在规定时刻升降圆球，人们可根据圆球的高度和降落瞬间来调节船上的钟表。

到了现代社会，无线电信号的出现让时间传递变得更简单、快捷，并且出现了短波授时、长波授时和低频时码授时等多种方式。（《北方新报》）

史海钩沉 轮椅运动漫谈

对于肢残人士，轮椅就是他们的腿。失去了灵活的双腿，就意味着与运动绝缘？不，轮椅实现了残障人士锻炼身体的可能，更重要的是使他们更多地参与社会活动。

英国小城市斯托克·曼德维尔曾冠名了一项享誉世界的赛事——斯托克·曼德维尔运动会，1997年更名为世界轮椅运动会，后又演变为世界轮椅和截肢者运动会，每两年举行一次。由于是第一次制度化的残疾人体育竞赛活动，世人将其视为国际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雏形。

创始人英国医生路德维希·古特曼，当时一直在研究治疗脊髓损伤的最佳方法。这位医生不仅致力于治病，而且还对病人复健尤其重视，希望能帮助他们恢复正常的生活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，许多士兵在战斗中受伤，有的还失去了双腿，这些残疾士兵经常感到沮丧和愤怒。古特曼开始采用运动疗法来帮助他的病人，鼓励他们参加体育活动，尽可能恢复尊严。

1952年，国际斯托克·曼德维尔运动会联合会在英国成立，并于当年举办了首届国际残疾人运动会，这项活动规模逐步扩大，来自其他国家的残疾运动员也参加了。1960年，在罗马第17届奥运会结束后，来自世界23个国家的400名残疾运动员参加了在罗马举办的第九届国际斯托克·曼德维尔运动会，而这届运动会后来也被国际奥委会正式承认为第一届残奥会，古特曼医生也被称为“残奥运动的顾拜旦”。（《北京日报》）



▲夏县宇达青铜产业园“挑战”雕塑 记者 刘亚 摄

文史漫步

射箭展露别样时代光彩

射箭活动起源于远古人类狩猎、生产生活的需求，发展至今，经历了狩猎、战争、娱乐竞技功能的演变。

石器时代出现了早期弓箭，弓为木杆，箭头为石或骨磨制成尖状。由于弓箭具有的远距离杀伤能力，增加了人类征服自然的威力，《越绝书》卷十一中记载“禹穴之时，以铜为兵”，说明在金石兼用的夏禹时代已出现了铜镞；殷商之后，铜镞代替了石镞，弓箭演化为军事武器，弓箭的社会需要决定了它的社会地位，由此，射箭技能最早进入了中国古代学校教育的范畴，夏朝已经有了专门的习射机构“序”。《孟子》云：“序者，射也”。西周时，出现了我国最早的教育体系“六艺”，要求学生掌握“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”六种基本才能，谓为“君子六艺”，是古代男子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的基本素质。商代统治者拥有强大的军队，而军队的主干是由贵族家族的成员组成的，因此“射”在贵族阶级教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，商代除步射外，还出现了骑射形式，广泛应用于军事训练，已经带有浓厚的体育竞技意义。



▲第十一届亚运会纪念币武术类运动射箭形象 记者 刘亚 摄

到了汉代，射箭活动普及，竞技性的比赛形式不断出现，在西北地区的军中，盛行被称为“秋射”的射箭比赛。随着射箭技术的不断发展，唐代出现了专门研究射箭技术的理论著述，如王珣《射经》、张守忠《射记》、任权《弓箭论》。宋代由于边境环境的纷争变化，民间自发地组织了弓箭社，弓箭社在抵御外

患和保卫家乡安全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，对推广民间武术活动起到了积极作用。

清朝以后，随着火器时代的到来，弓箭逐渐在战争中降低了它的作用，但作为一种强身健体和培养意志的基本训练，射箭却一直一直在宫廷、军旅乃至民间经久流传。清代皇帝曾将“骑射”列为重要的治国方略之一，为防止八旗军贪图安逸、荒废骑射，将“射猎”作为训练皇室贵族、八旗子弟最重要的技能之一，自康熙帝始，设立木兰围场，率领王公贵族、百官、八旗士兵及内蒙古四十九旗的官兵，举办以狩猎为主要活动的“木兰秋狝”，此后形成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，成为清朝皇帝联络北方蒙古诸部和其他少数民族的重要典礼活动，“木兰秋狝”成为校验士兵军事能力，考核军队作战能力的大型政治活动。

经过数千年的发展，射箭运动已经成为我国传统体育文化项目。国家体育总局开展的体育六艺系列活动中，射箭作为重要内容也融入其中，散发出了别样的时代光彩。（《中国体育报》）